

创新发展的理论基础

——读李松龄《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几点体会

■ 李松龄 湖南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创新与发展内含辩证的逻辑关系,即有创新才会有发展,创新是前提、是条件,发展只是创新的结果。所以,研究创新发展重点是研究创新。目前,讨论创新问题,集中在为什么要创新和如何创新上的文章见多,当然这是必要的。作为理论工作者,探讨创新发展的理论基础,我认为也是必须的。尽管也有文章研究这个内容,但只是以熊彼德的增长理论为依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尤其是它的基础理论—劳动价值论进行研究的,却是见诸不多,或者说没有。我国一再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而在创新发展的问题上,只是借助熊彼德的增长理论,未免有点说不过去。因此,我想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对创新发展的理论基础谈点看法,不当之处,还望理论界的同仁们提出批评指导意见。

创新其实是使用价值的创新。“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资本论第一卷,下同)。创新的对象是物或者说是商品,如果物或者商品只有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差别,就不能说物或者商品有创新,只能说它是改头换面。我国的许多产品为了博得一个好的市场价格和丰厚的利润,往往冠以创新的名义,其实只是改头换面而已,其中尤以药品为甚。我国的创新工业园区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生产的产品同其他园区没有质上的差别,怎么能说是创新工业园区呢?无非是借创新工业园区之名得政策之实惠罢了。所以,判断一种物或者商品是不是创新,标准不是别的,就是看它的使用价值有没有变化,使用价值没有变化的就不能说是创新。使用价值变化了,人们对它产生了新的需求,不只是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且也因为改善了人的生活状况,因而也可以说是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只有使用价值的不断创新,才能保障社会的创新发展。

如何抵御经济刺激政策诱惑?

■ 陆丁 加拿大菲莎河谷大学经济学教授

所谓“新常态”,是自 2012 年末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对现阶段经济发展状况的一个基本判断。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话来说,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个转变过程的难点在于应对“三期叠加”的局面,也就是从高速到中高速的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笔者认为,这个判断是合乎实际的。中国经济在实行改革开放后实现了连续三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壮大了二十多倍。制造业发展起来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劳动力素质改善了。同时,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求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人口老龄化趋势在强化,经济发展和资源限制和生态环境的矛盾累积加剧。显然,原有的粗放型依靠大量投入劳动资本土地消耗资源的高速增长模式已经难以维系,亟需调整结构优化升级,组建新的驱动方式。然而,在 2008 年那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发生后,为避免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中国配合国际社会,推出空前规模的一揽子刺激政策,保持了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稳定了全球经济局势,但也延缓了本来应该实行的本国经济结构调整,留下了金融资本脱实向虚、企业债务(杠杆)偏高、地方融资债台高筑、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一系列后遗症,埋下了金融风险隐患。

针对“三期叠加”,中国政府宣示的指导思想是“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承诺将发展理念从片面追求经济数量增长向注重效益、以人为本和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转变。早在本国政府伊始,欧美媒体就有所谓“李克强经济学”的三个支柱之说,即“避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其核心是向市场放权让利,激发创新活力。

在今年 3 月初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中国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实重申了上述政策理念,坚称以“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来应对“持续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我们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而是持续推动结构性改革。”“提质增效,推动产业创新升级”、“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展。

使用价值是由具体劳动生产出来的。“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着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或有用劳动。各种使用价值如果不包含不同质的有用劳动,就不能作为商品相互对立。”马克思说的有用劳动就是与抽象劳动相对立的具体劳动。使用价值因为创新变成了不同于原来的使用价值,意味着具体劳动不再是原来的具体劳动,也就是说,使用价值的创新其实是因为具体劳动的创新。具体劳动的创新是因,使用价值的创新是果。过去,我们只把劳动区分为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只是用劳动的两重性解释商品的两重性,即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而未能把具体劳动区分为创新劳动和重复劳动,因而对劳动的创新引起使用价值的创新,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缺少深入的研究。我们的注意力仅仅集中在抽象劳动生产价值和由价值体现的人与人的关系上。西方经济学正是利用效用价值理论对生产力和创新等问题作了细致的分析,对生产力和创新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我国因为重视价值关系的研究,对具体劳动创新的问题探讨较少而比较忽视了生产力和

创新方面的理论探讨。

具体劳动的创新是有条件的,除了劳动知识和技能的不断积累以外,还需要诸如分工、资本、教育、意识形态和制度等等方面的协同作用。分工能够使劳动者专务一业,从而有利于提高他的劳动熟练程度和技能,也有利于他专心致志地改良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实现具体劳动的创新·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一书中已经作了深入的论述,资本是具体劳动创新的不可替代的工具。可以说,人类社会的每一项创新都离不开资本的参与。资本的不断增加使用和创新使用使得具体劳动的创新得以实现。手工制针变为机器制针,水动力变为蒸汽动力,机械化变为自动化,都是因为资本的参与而实现的。人类认识能力是分工和资本有效利用的前提条件,而认识能力的提高又是教育的结果。没有现代教育的传播和普及,很难说有现代分工和资本利用的水平。应该说,一个教育落后的国家是不可能水平较高的分工体系和资本利用结果的,美国社会的高度化分工和资本的有效利用,都是得益于现代化教育的结果。一个开放式的具有独立思考 and 学术自由的教育体系是具体劳动创新的充分必要条

件。这就涉及到了开放包容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其中,智力或思想力的发挥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的。一个开放和包容的意识形态,有利于智力或思想力的开发,从而促进具体劳动的创新。一个封闭和排斥的意识形态,则会制约智力和或思想力的开发,不利于具体劳动的创新。意识形态只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正式的制度安排也会对具体劳动的创新产生积极的或者消极的作用。不利于平等竞争的制度安排,比如权力支配教育资源或者科技资源的体制,就对具体劳动的创新产生很大的影响。我国创新的积极性不高,制度约束是一个重要方面。

我国要实现具体劳动的创新,从而达到使用价值创新和创新发展的目标,就必须在使用促进分工、使用资本、发展教育、开放意识形态和改革制度等方面狠下功夫。市场促进分工,不断地发育、健全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和机制,就能够形成现代化的社会分工体系。权力干预市场对社会分工不利,而且对诸如分配不公、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如果把由此形成的社会问题归咎于市场经济,则会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不利于分工体系的完善,制约创新发展。我国的资本总量不算少,但用在创新上的数量明显不足。一方面是因为创新的收益具有风险,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虚拟资本和实物资本收益结构上的差异,导致创新资本不足,影响创新发展的速度。调整资本结构是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发展具有独立精神和学术自由的教育,不仅仅是大学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而且必须从中小学教育抓起;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情,而且要和意识形态的开放与包容有机结合起来;不仅仅按教育规律办事,而且要改革学校的官本位体制。只有通过制度改革,把教育资源、科技资源及其他资源充分调动到创新上来,创新发展的目标才有光明的前途。

社会政治体制的稳定根基。在决策程序机制上,重大的财经决策,都是由中共核心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定夺之后,由行政机构执行的,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制衡基本属名义上的事后认可。在维护体制稳定的刚性需要和权力制衡的软约束之间,扩张型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必然成为唾手可得、随时可以动用的方便工具,于是,“稳增长”往往演化成了压倒一切的“保增长”,原来“去库存、去杠杆”的政策意向往往被“增产能、加杠杆”的利益驱动所取代淹没。

第三种可能是监管者掌握了尚未公开的经济资讯,如此决策另有缘由。对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数据的真实性,各界早有怀疑。一种流行的看法是,官方的增长数据往往在快速增长时期被低估,而在经济放缓时期被高估。如果实际上中国经济下滑的势头确如一些投资机构所猜测的那样比官方数据所显示的情形要来得更为严重得多,这一轮宏观经济刺激的强度就不那么令人费解了。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在“三期叠加”的种种困难和问题尚未解决理清的情况下,竟然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财政货币扩张,显然是令人担忧的。

从中国经济结构的基本面来看,经济的自然增长率显然已经降低了许多,并且将在未来 5 年—10 年间继续下行。这个新常态已经是学界的共识。经济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在于尽可能将实际经济增长稳定在长期的自然增长率水平上,而不是人为地推高增长。如果错误估计了自然增长潜力,把自然增长率的下行误判为需要纠正和抗拒的“严峻下行压力”,采取种种扩张政策手段去过度刺激,追求不切实际的增长率,只能造成经济虚火上升,杠杆不去反增,产业库存堆积更多,资产泡沫膨胀,僵尸企业横行,经济效益低下,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剧,甚至威胁到国民经济的长期增长前景。

宏观经济调控应当恪守本身的目标原则,把决策确立在对于长期的经济自然增长率趋势的客观科学估计之上。决策所依据的资讯应当透明公开,理念目标应当明确坚定,言行一致,建立公信。在现阶段,如何抵御动用宏观经济刺激政策去保增长的种种诱惑,从体制上确保贯彻正确的经济理念和指导方针,是比追求中短期的增长目标更具挑战、更为重要的当务之急。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栋生	陈全生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圆晨	范恒山	樊 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葛志荣	谷书堂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 康	江春泽	金 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京文	李维安	刘诗白
刘 伟	茅于軾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 杰
吴 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启先
张曙光	张晓山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马克思主义创新观微说

——读李松龄《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几点体会

■ 管益忻 教授

在读李松龄教授的《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一文中,我有以下几点微说。

其一,创新是用户逼出来的。

诚如作者所说,所谓创新,从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体系视角看问题,这是指的使用价值的创新。那么,使用价值的创新是怎么实现的呢?我认为,是用户“逼”出来的。这并不否认企业的积极性。问题在于企业的全部经营运作说到底是为用户的,为用户生产他需要的产品。然而,这决不是说企业自动的“自觉自愿”而毫无外在的助推力地就去创新了。它的创新是在用户“逼迫”之下的产物。没有用户的逼迫就没有企业的创新。

这儿应当强调的是,企业面临着二个方面的竞争,既有同行之间的竞争,更有同用户的竞争,后者才是根本。

作者阐说道,判断一种物或者商品是不是创新,就看它的使用价值有没有变化,使用价值没有变化的就不能说是创新。然而,这个新“使用价值”要变化,要提升品质就需要有一个外在的动力。比如说一些人开始感到 3G 手机有一些缺憾,迫切需要更新的版本了,这便迫使企业研发,生产出 4G 的了。而老是保守于中国传统,不方便人们如厕,人们甚至不惜跨国门从日本购买马桶背回来用,这不是在逼中国企业创新吗?

其二,企业面对用户,是竞争,不是竞争。

竞争之“竞”、“争”是有内在联系的二个概念。从交易链终端说,使用价值(产品或服务)是直接面对用户的,特别靠企业内功生产好产品实现,这主要是竞(争)。交换价值(货币)则在交换计算过程之后归企业,这一过程中存在有企业同用户之间的(竞)争。前者是决定用户买不买的问题,后者则是决定买卖双方交易能否达成的讨价还价的问题。

作者指出,每个商品中的使用价值都包含着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或有用劳动。这就是说企业生产的产品必须体现用户的目的,体现了,用户认同的是“有用劳动”;不体现就不是“有用劳动”。

眼下诸多三、四线甚至某些二线城市有多少“库存”的高楼大厦无人问津啊!

其三,“创新劳动”与“(重复)非创新劳动”是一条必须划清的原则界限。

创新的劳动在今天即可理解为供给侧劳动,(与有效资本相对应)有效劳动。过剩的产能,过剩的产品那就是必定是无创新内涵的非创新劳动。

作者提出,多少年来,我们的理论只停步在马克思原著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的研究上,而未能把具体劳动区分为创新劳动和非创新(重复)劳动,因而对劳动的创新引起使用价值的创新,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缺少深入的、细致的探讨。倒是西方经济学从效用价值理论视角对(生产力和)创新等问题作出了一些分析,对生产力和创新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在今天,创新已成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理念之首之际,创新与否已成为决定全面深化改革以至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成败的关键命题。

其四,必须强调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

任何实在的创新都是在特定企业即特定个别资本单元中进行的。

以具体劳动达到的创新是有条件的,除了劳动知识和技能的不断积累以外,还需要诸如分工、资本、教育、意识形态和制度等等多方面的协同作用。而这一系列生产要素、资源配置只能在个别企业即个别资本单元之中进行。这是我们为什么强调资源配置成败市场起决定作用的根本缘由之一。可以说,人类社会工业化以来的几乎每一项创新都离不开资本(企业主体)的参与。资本(企业)的增加使用和创新是使用具体劳动的创新得以实现之二法门。

其五,市场化分工体系中不包含行政权利。

尽管科斯说过,作为市场的替代物,政府也是企业,是超级企业。然而动辄行政权力干预市场,打乱社会特别是企业内部的分工,甚至肢解企业流程,使企业无法正常运营,这就越位、错位了。为什么多年来国企经营效益总不如民企,而至于分配不公、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等弊端源于行政权力负面影响、作用。如果把由此形成的社会问题归咎于市场经济,则会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不利于分工体系的完善,制约创新发展。我国的资本总量不算少,但用在创新上的数量明显不足。

最后还要说的一点是,我们现在讲的创新已非简单的熊彼特创新,那只是在个别企业、单一价值链内进行的,也不仅仅止于弗里曼官产学研综合创新,而是要进入包括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在内的 ICT 时代的创新。